

建设新的史学史：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唯物史观转向

任 虎

【摘 要】清末以来,中国史学史学科在史学专业化进程中得以确立,其早期发展受梁启超史学史方法论影响较大。1949年以后,唯物史观确立指导地位,全国各高校尝试应用唯物史观改造中国史学史学科,但受限于“苏联模式”教学改革而暂时中止。受1955年以来苏联“历史科学史”研究热潮和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基础影响,中国史学史学科在1956、1958年被纳入新中国历史学科十二年远景规划,在1961年被确立历史学科主体地位,掀起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史学史研究热潮。以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史学史研究得到学界广泛认可,在新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中国史学史;唯物史观;学科建设;苏联史学

【作者简介】任虎,杭州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杭州 311121)。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京),2024年下卷.23~3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苏联史学在华传播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24CZS116)阶段性成果,并得到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计划重大项目(2023SKZD06)资助。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形成、发展和繁荣,是近现代史学专业化的重要表现。在学科百年发展历程中,方法论体系从雏形走向成熟,课程上升至历史学科主体地位,学科交流日益活跃,研究成果得到海内外广泛认可,形成鲜明的“学派”和“重镇”学术传承脉络。学界关于百年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已有较多回溯和检讨,但多集中于民国和改革开放后两个时期,对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学科建设缺乏系统探究^①,或以“意识形态化”“物质决定论”来概括唯物史观史学史研究。本文立足档案、口述和文献史料,从制度建设和学术流派层面梳理并分析唯物史观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道路。

一、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早期发展

从学科体制和研究方法论而言,受中国传统

四部之学分类和西方近代学科专业化影响,历史学因“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②其学科地位自清末学制改革即得以确立。同时,受日本史学影响,具有史学史内容的史学研究法类课程自“新史学”运动后受到重视,“在科目安排上,注重史学方法的训练”。^③

民国时期,各高校虽受国民政府教育部领导,但因限于社会经济条件差异和师资力量分布不均,专业课程基本由各高校教授会议或院系自主编订。1924、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国立大学校条例》和《大学规程》,强调高校院系自主规划课程,“各学院或各科之课目分配及课程标准,另定之”。^④1932、1935年,教育部发布《师范学校法》和《修正师范学校规程》,虽计划统一课程大纲“由教育部定之”,^⑤但考虑客观条件不充分后,仍

允许“师范学校课程标准另订之”，教员可“自编教材”。^①1938年，教育部发布《师范学院规程》，亦未规定师范学院史地系课程标准。^②以上说明，从清末至1938年，各高校历史院系缺乏统一课程标准，自主决定设置史学史学科。

实际上，随着史学专业化进程，史学史学科成为历史学科建设的重要方面，受到各高校历史院系重视。各历史院系因需“于本国、外国史学之变迁利病及治史方法，尤宜深知灼见”，大多将史学史尤其是中国史学史设为必修或选修科目，北大史学系更标榜“本系最重要之学科”。^③1918年，北大史学门黄节讲授“中国史学通义”，作一年级课程。^④1919年，朱希祖长北大史学系，更要求常年开设“史学史”“本国史学概论”“本国史学名著讲演”“中国史学史”，将“史学史及史学原理”单独作为六个历史学主要课程类别之一，得到“国内公私大学史科纷纷仿行，于是中国史学乃得跻于科学之列”。^⑤

直至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全国高等院校课程标准，开始从制度建设层面确立史学史学科地位。《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必修科目表》列“中国史学史或史学方法”与“西洋史学史或史学方法”。^⑥《师范学院史地学系选修科目表》列“中国史学史或史学方法”。^⑦高等院校课程标准正式纳入史学史科目，基本得到各院校认同，部分院校甚至建议提升史学史课程学分。^⑧

就学术发展而言，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较晚，及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尚未有系统理论，“此科在中国尚在萌芽时代”，“见于著作者极渺”，^⑨且形式多为课程讲义。以北大为例，1918年，黄节在史学系编《中国史学通义》，分述“中国史学通义(概论-注)”“《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讲义通过“比次”前四史，阐述史学“事具始末、文成规矩”，蕴“《春秋》之义，昭乎笔削”。^⑩1919年起，朱希祖编中国史学史讲义，系统梳理“中国史学之起源”与“中国史学之派别”，希冀通过“叙述

中国各种史体发展之大概”以“略论其利弊”。^⑪

梁启超从方法论层面对史学史学科作出巨大贡献。梁氏自20世纪初批判“中国之旧史”弊端，揭橥“新史学”和“史界革命”，发出中国史学史先声。^⑫1922年，梁氏《中国历史研究法》简要回顾从原始部落时代史学知识产生到清朝史学发展。^⑬1926-1927年，梁氏首次从方法论角度讲述《史学史的做法》，提出研究内容“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⑭梁启超史学史方法论对中国史学史学科具有里程碑意义，被誉为“自章学诚《文史通义》以来，对于一般史学之究研盛有成绩而且著成专书者，惟有梁启超氏之《中国历史研究法》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而已”。^⑮

梁启超史学史方法论被民国时期各高校广泛应用于课程，1941年金毓黻按照梁氏提法编《中国史学史》，更被列为“大学丛书”，^⑯进一步确立梁氏方法论权威性。梁启超史学史方法论是民国时期中国史学史的主流写法，产生了几部较知名著作，如魏应麒《中国史学史》、王玉璋《中国史学史概论》、傅振伦《中国史学概要》、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等。1940年，白寿彝与李源澄在云南大学文史系开授“中国史学史”，即参考魏、王、金三书“按年代顺序讲解的史学要籍解题”。^⑰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唯物史观改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共同纲领》文化教育政策、1950年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和1951年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指导下，用唯物史观“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成为重要任务，各高校竞相应用唯物史观于教学改革。^⑱对于发展20余年的中国史学史学科，在新课程标准未制定前，高校基本延续旧式目录要籍讲法，如1949年陈述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史学史”课程讲授“由史学萌芽到现在史学的发展”，^⑲1950年刘节在中山大学历史系



开设“中国古代史学史”。^④随着思想改造运动的开展,各高校陆续进行唯物史观改革。

1949年暑期,北平各高校积极开展以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重要内容的马列主义学习运动,^⑤史学史课程成为唯物史观改革的重要内容。1949年秋,杨翼骧对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学史课程“主动作出了新的改进”,比较中西古代史学情况,并以梁启超和李大钊为起点梳理近现代资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史学。^⑥1950年2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鉴于“有的课程在教材上未能认真的应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当批判史料”,成立侯外庐、陈述、白寿彝“史学史”教学小组,开设“中国史学史”讲解“历代中国史学之发展”。^⑦1951年8月,白寿彝用唯物史观改革中国史学史课程,强调探究“史学与其社会基础间、各种上层建筑间,及史学内部相互间之关系”,并专列“毛泽东和历史科学在中国底建立”“当代史学界”“中国史学底前途”。^⑧

随着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发布《关于高等师范学校的规定(草案)》和《师范学校暂行规程(草案)》等文件。院系改革强调教学改革计划性和集体性,规定教学“采用中央教育部审定或指定的教科书”。^⑨“苏联模式”成为改革主要目标,部分院校明确“认真学好苏联先进经验,稳步地做好教学改革……学好苏联先进经验是我们的工作中首要任务”。^⑩

随着“苏联模式”院系改革,新中国初期的史学史学科发展受到较大限制。苏联自20世纪30年代发起历史教育改革以来,历史学科主要由依据社会形态理论和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基础的“四大块”通史^⑪和殖民地历史构成,史学史尚未受到重视,至50年代初仍未取得成绩,甚至1953年《苏联百科辞典》亦未收录史学史相关词汇。^⑫同时,由于中国史学史常作专业选修课,对教师专业性和学生知识储备有较高要求,难以适应课程改革初期阶段要求。各高校历史院系多聚焦当下急

需的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改革,暂时停设中国史学史课程。^⑬

1952年6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学计划》删去“中国史学史”。^⑭1952年7、10月,华中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历史系《教学计划》虽列“专籍研究”(例如中国史学专辑研究)和“专门史”(例如中国史学史、中国文化史),^⑮但考虑“选修科目乃是给学习必修科目有余力的学生而设”,^⑯在11月课程表取消。^⑰1954年,教育部发布《师范学院暂行教学计划》,规定历史系不设置中国史学史课程。^⑱直至1955年底,全国各综合大学和师范院校历史系在院系改革后,仍未重视在历史教学中设置史学史课程。^⑲

三、全面建设时期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复兴

新中国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复兴,与1956年历史科学远景规划编订有密切关联。1955年底,党中央和国务院成立周扬、胡绳、潘梓年等“九人小组”,统筹编订历史学、哲学、文学等学科发展规划。历史学由胡绳、范文澜、刘大年、侯外庐、尹达、张稼夫、黎澍、向达、陈垣、夏鼐负责。^⑳1956年1月,党中央发起“向科学进军”,计划“有系统地利用苏联科学的最新成果”编制1956-1967年科学发展规划,指导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学研究工作,以“尽可能迅速地赶上苏联水平”。^㉑

历史学规划小组结合苏联最新动态和中国实际,于1956年4月发布《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初稿)》(以下简称《历史规划》)。《历史规划》将“对中国封建时代史学的批判与总结”和“西洋史学史的研究”列入“其他重要研究题目”,将“中国史学史”列入“需要加强的薄弱学科和空白学科”,^㉒作学科回顾并制定研究规划:

加强这门学科具备的条件:解放前有些著作,但偏重于整理工作。用科学的观点进行总结尚已开始。

加强这个学科要采取的措施:由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三所和各高等学校合作,至1956

年设立史学史研究组,负责组织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工作和培养干部。^⑧

《历史规划》预定在1956-1969年出版《对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批判》和《对中国封建时代史学的批判与总结》,在1958-1967年写出西洋史学史论文,在1960年出版40万字《中国史学史》。^⑨1956年6月,《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初稿)》(以下简称《哲社规划》)发布,突出研究“世界史学各学派的史学理论和重要历史著作的研究和批判”,计划在“1967年以前写出中国史学史”。^⑩史学史学科为什么会重新进入学科建设重点领域,尤其突出“批判与总结”职能呢?这与苏联史学新动向有关。

二战后,冷战背景下苏联史学界将目光转向资本主义史学界,聚焦对世界通史和历史理论问题展开论战,确立苏维埃史学话语权成为苏联“四五计划”的重要任务之一。苏联科学院积极响应号召,在1946年成立以沃尔金为首的“历史科学史委员会”,1949年改由齐霍米诺夫领导。^⑪1955年8月,齐霍米诺夫主编的《苏联历史科学史概论》第1卷出版,掀起苏联史学界关注史学史研究热潮。《历史问题》杂志组织讨论该书后,自1955年第12期开始陆续刊登评论文章,尤其在1956年第1期的社论中以《论历史科学史的研究》明确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

任何一门科学,如果不深刻研究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顺利地发展起来。这样的研究可以帮助更好地掌握已获得的成就,并推动科学前进。历史科学史(史学[史])的目的是:研究许多世纪以来的历史知识的积累过程和历史科学的发生与发展的过程,研究历史科学中各派别的斗争。史学[史]的任务是:揭明历史科学发展的规律性,表明具体历史环境、阶级斗争和当代的政治、哲学及其他观点对于历史思想的制约性。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史],应该一方面推翻伪造的唯心主义理论,一方面帮助人们了解唯物史观的发生、建立和胜利的

规律性。……苏联历史学家已着手编写有关本国和外国的历史科学史的综合性著作。^⑫

该文对加强史学史研究和在高校历史系建设史学史学科的提倡,受到正处于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期间的中国史学界高度重视,因此迅速被《史学译丛》第2期翻译刊登。6月,《新华半月刊》转载《史学译丛》译文,结合概念本义和中国历史学实际后,将原译名“史学”径改为“史学史”,并突出强调建设“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史”的时代价值。^⑬

在“全面向苏联学习”口号的影响下,苏联提倡加强史学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热潮传入国内,对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产生较大刺激,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史学史学科兴起奠定了基础。^⑭因此,1956年《历史规划》不仅强调加强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和教材编纂,还将齐霍米诺夫主编的《苏联历史科学史概论》第1卷列入“外国古典和近代有参考价值学术著作翻译整理出版计划”,预计在1965-1967年完成45万字,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及历史学家》紧随其后。^⑮甚至在“编著新型的中国史学史尚需时日”的情况下,只能暂时由商务印书馆于1957年12月重印金毓黻《中国史学史》,首次印数就达8000册。因为金著虽按旧式写法,但其“征引资料较富,可供教学研究参考之用”。^⑯

随着50年代中后期“反教条主义运动”和中苏关系持续变化,史学界关于突破“苏联模式”并用唯物史观编写“中国话语”教科书的呼声日益高涨,这在史学史学科反映尤为明显。1958年,史学界修订1956年《哲社规划》,7月《哲社规划》修订稿就凸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重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和“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批判、世界各国历史学各学派的研究和批判”,计划在1967年以前“写出《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和“文化史的各种专门著作,如中国史学史、经学史、宗教史等专著”。^⑰

通常将1961年史学史研究热潮作为中国史学史发展里程碑,忽视其背景是1960年初苏联历史科学史委员会主席涅契金娜《论苏维埃时期史学史的分期》一文引发的苏联史学史研究大讨论。^⑧苏联史学史研究热潮对新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影响,直观表现在1961年3、4月由中宣部和教育部主持召开的高校文科教材会议,确立编写“中国自己的”高校新文科教材。^⑨1961年5月,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表(修订草案)》,从教材层面确定历史院系专业设置和课程安排,确立史学史学科作为历史系主体课程,教材编写分工见下表。

随着高教部指导开展史学史学科建设,学界积极讨论史学史教材编纂和学术研究,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多次举办史学史学术研讨会。1961年6月和1962年1、3月,在上海高教局组织下,陈望道、周予同、周谷城、耿淡如、蔡尚思、束世澂、吴泽、李平心、陈旭麓、陈守实、魏建猷、谭其骧、金兆梓、柴德赓、郭圣铭、袁英光、桂遵义等,讨论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分期、教科书编写和研究内容。^⑩1961年8~10月,陈垣、熊德基等在北师大、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和武汉举办讨论会,方壮猷、王

毓铨、尹达、白寿彝、刘节、张鸿翔、孙书城、何兹全、郑天挺、郑鹤声、胡厚宣、侯外庐、柴德赓等讨论中国史学史研究目的和性质、主要内容结构、历史分期、写法等问题。^⑪

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中国古代史学史和近代史学史编写组,以唯物史观指导课程改革,编制教学大纲和讲义,创办史学史研究期刊(如《中国史学史资料》),培养中国史学史专门人才,奠基了新中国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学术谱系。1961年6月,教育部向北京师范大学发送《关于参加文科教材编选工作的通知》,其中第三条为:“《中国史学史》(与华东师范大学共同负责),由白寿彝和华东师范大学吴泽负责。要求1962年7月完稿。”^⑫北京师范大学高度重视,在10月《教学工作纲要(草案修改稿)》明确“文科对所承担编写的重点教程”《中国史学史》,要“加强领导,提高质量,按期完成”,“本学期文科科学研究的重点是编写好所承担的教材”。^⑬

随着1961年高教部确立史学史在历史学科中的主体地位并规划编写教材,全国各高校历史院系基本规划设置中国史学史课程。1961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根据中央教材会议精

1961年高教部委派承担史学史教材计划

课程名称	教材名称	解决办法	负责单位	负责人	参加单位
中国史学史	中国史学史	编写	北京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白寿彝 吴泽	南京大学
外国史学史	外国史学史	编写	复旦大学	周谷城 耿淡如	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
	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流派资料选辑	编选	复旦大学	周谷城 耿淡如	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
史学名著选读	中国史学名著选读	编选	南开大学	郑天挺	四川大学、山东大学、西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外国史学名著选读	编选	武汉大学	吴于廑	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资料来源:《历史专业教材编选计划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表(修订草案)》(1961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教务处档案:《一九六一年教育部有关文科教材编选工作的文件及本校文科四系(教、中、历、政)教材选编计划和统计》,档案号:1961-11-2。



神”,制订1959级和1960级《过渡教学计划表》,将“中国史学史”和“外国史学史”纳入“专业共同课”,两个年级分别为100课时和91课时。^⑧同年,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前身)历史系计划在暑假后给三、四年级“补上史学史和史学概论”,“各以一学期计算,每周二小时”。在具体安排中,中国现代史组、中国近代史组、世界古代史组、世界现代史组教师均需参与备课和讲授,以便在“1962年下半年史学史上半学期”。^⑨复旦大学历史系也由陈守实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⑩1961年以后,华东师范大学多次组织中国近代史学史专题讲座。^⑪1964年下半年,四川大学历史系由蒙默开设“中国史学史(选修)”。^⑫

经过50年代中后期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和1961年高校文科教材会议,史学史学科在历史学科中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中国史学史”作为历史学大类被正式纳入1961年《辞海》“历史卷”,^⑬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地成为史学史研究的重要阵地,皆标志着史学史学科发展进入繁荣期。

结语

自清末以来,中国史学史在史学专业化进程中承担着学科史角色,其主要职能是梳理中国史学发展进程,如史官制度演变、历代重要史家及史著、史著体裁得失等,来为历史学科发展提供前进方向。梁启超史学史方法论是史学专业化进程的产物,但其以史家及史著为主要内容,往往流于“史学要籍解题”形式,难以分析史学发展变迁反映的社会性、群体性、现实性等因素,又将重返他所批判的传统史学“四弊”“二病”之窠臼。即使是应用梁氏方法论的金毓黻,也承认该做法“缺点甚多”,“只就过去三千年间之若干史家、史籍,加以编排叙述,殊不足以说明祖国史学产生发展演变之主流所在”。^⑭

1949年以后,唯物史观中国史学史研究虽建设于民国时期史学史学科发展基础之上,但并非完全摒弃旧式以史家及史著为主体的做法,也“决

不当是史笈介绍、史家传记或史观的简单排比”,^⑮而是试图“用科学的观点进行总结”。^⑯唯物史观中国史学史研究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依据,突出以“点一面一线”研究方法:将史家及史著置于社会经济条件,通过剖析史家及其史观的阶级属性和民族立场,还原该时期阶级斗争形势与社会发展阶段,通过联系社会发展规律,重塑中国史学发展历程。唯物史观中国史学史研究并非单纯强调“意识形态化”或“物质决定论”,20世纪后半期白寿彝等人在批判继承梁启超史学史方法论的基础上,不断深入并推进探究历史理论、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等研究领域,^⑰在社会形态与史学发展、史学思想流派的传承延续、文字与史学关系、民族主义与史学变迁等方面产生了丰硕成果。唯物史观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优越性得到广泛认可,旧式研究者也在接受唯物史观后尝试应用其来改造中国史学史。^⑱

新时期以来,回顾、检讨与反思成为中国史学界主要思考取向之一,史学史学科再度进入学界视野。白寿彝、吴泽、尹达、杨翼骧、桂遵义、瞿林东、吴怀祺、陈其泰等人在60年代史学史研究基础上推陈出新,进一步发展史学史研究理论与实践,涌现出大量中国史学史教材和研究论著。当下,史学史研究在总结百年发展历程的经验基础上,仍要继续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积极发扬史学史研究优良传统,不断开拓新视野、运用新方法、解决新问题,以推动史学史学科进一步发展繁荣。

注释:

①参见周文玖《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瞿林东《白寿彝先生和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回族研究》2004年第2期;乔治忠《杨翼骧教授与南开大学史学史学科建设》,《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姜胜利《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恢复与发展》,《史学



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8年下卷;王传《论民国时期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与著述特点》,《河北学刊》2020年第1期;任虎《继往开来: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唯物史观转向》,《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3期;等等。

②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第1页。

③王应宪:《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再探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④《国立大学校条例》,《教育公报》1924年第1卷第3期;《大学规程》(1929),国民政府教育部参事处编《现行重要教育法令汇编》,国民政府教育部秘书处公报室,1930,第6页。

⑤《师范学校法》(1932),国民政府教育部参事处编《教育法令汇编》第1辑,商务印书馆,1936,第196页。

⑥《修正师范学校规程》(1935),国民政府教育部参事处编《教育法令汇编》第1辑,第200页。

⑦《师范学院规程》(1938),国民政府教育部参事处编《教育法令汇编》第4辑,正中书局,1939,第46页。

⑧《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1924-1925年度),《北京大学日刊》1926年12月3日,第2版。

⑨《文本科第三学期课程表》,《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4月12日,第2版。

⑩傅振伦:《先师朱述先先生行谊》,李孝迁、任虎编《近代中国史家学记》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第1161~1162页。

⑪《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必修科目表》,国民政府教育部参事处编《教育法令汇编》第5辑,正中书局,1940,第61页。

⑫《师范学院史地学系选修科目表》,国民政府教育部参事处编《教育法令汇编》第5辑,第132页。

⑬《各院校对于历史学系课程意见》,王应宪编《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1912-1949)》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第903~905页。

⑭《山西省立教育学院史学系课程表(1934)》,王应宪编《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1912-1949)》上册,第371页。

⑮李默:《黄节先生著作知见目》,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顺德市政府文体局编《岭峤春秋——黄节研究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第164~165页。

⑯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独立出版社,1943,“序”第1页。

⑰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第1~11页。

⑱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5,第

11~41页。

⑲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商务印书馆,1935,第219页。

⑳魏应麒:《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1,第301~302页。

㉑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6,“略例”第1页。

㉒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173~174页。

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第10页。周恩来:《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胡维佳主编《中国科技政策资料选辑(1949-1955)》上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第14页。《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第352页。

㉔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教务处档案:《一九四九—一九五零年第一学期各系班级课程表》,档案号:1949-13-1。

㉕《刘节学术大事年表》,刘秀俊选编《刘节文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第370页。

㉖任虎:《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2年下卷。

㉗杨翼骧:《杨翼骧自传》,乔治忠编《杨翼骧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19,第469页;乔治忠:《史学史在历史学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乔治忠教授访谈录》,《史学史研究》2019年第3期。

㉘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教务处档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预拟课程表》(1950年5月),《一九五零—一九五一学年教学计划、课程表》,档案号:1950-12-6;《一九四九—一九五零学年第二学期各系教师任课时间表》,档案号:1950-13;《历史系工作报告》(1950年2月24日),《本校部分系学期工作总结》,档案号:1950-9-3。

㉙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学大纲》,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教务处档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课程草案教学大纲(1951年8月拟)》,《历史系1951年发展计划》,档案号:1951-4。

㉚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师范学校暂行规程(草案)》,华中大学教务档案:《一九五二年教学计划、课程表》,档案号:1952-6。

㉛《一九五二年度第二学期教学工作计划——一九五三年三月十四日第四次建校委员会通过》,华中大学教务处



档案:《一九五三年教学工作计划、总结、规定》,档案号:1953-1-2。

⑳即世界上古与古代史、世界中世纪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

㉑195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访苏代表团,刘大年在考察苏联史学界机构设置和研究体系时,也发现苏联史学界重视的研究方向没有史学史。参见刘大年《关于苏联历史学、历史学学术机构与历史学研究方法的考察报告》,张海鹏主编《刘大年全集》第13册,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第309~331页。

㉒《私立武昌华中大学全校性的迫切问题》,私立武昌华中大学秘书处:《组织大纲、工作报告、学校概况,各类规章、细则》(1950年),档案号:1950-6。

㉓北京师范大学教务处档案:《北京师范大学教学计划草案——本科历史系系组》(1952年6月13日),《一九五一年修订教学计划材料》,档案号:1951-7。

㉔《师范学院教学计划(草案)历史系》(1952年7月),《师范学院教学计划(草案)》(1952年10月),华中大学教务处档案:《一九五二年教学计划、课程表》,档案号:1952-1;《师范学院教学计划(草案)历史系》,《师范学院教学计划(草案)》(1952年10月),华中大学教务处档案:《一九五二年教学计划、课程表》,档案号:1952-2。

㉕《师范学院教学计划(草案)总说明》,《师范学院教学计划(草案)》(1952年7月),华中大学教务处档案:《一九五二年教学计划、课程表》,档案号:1952-1。

㉖《师范学院教学计划(草案)历史系》(1952年10月),华中大学教务处档案:《一九五二年教学计划、课程表》,档案号:1952-2。

㉗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历史系暂行教学计划》,《师范学院暂行教学计划》(1954年4月)。

㉘翦伯赞:《新中国的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翦伯赞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第155~160页。

㉙周年昌:《有关建国以来三次历史学规划制订情况的回忆》,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部工作局编《人民共和国是一切胜利之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离退休干部征文选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第149~150页。

㉚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胡维佳主编《中国科技政策资料选辑(1949-1955)》上册,第159~161页。

㉛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办公室印《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初稿)》(1956年4月),第6、8、9页。周谷

城曾回忆:“1956年也抓过一次[编写世界史学史],去北京开过会。但写了大纲,一直未编出来。”转引自宫陈《20世纪60年代初上海史学界关于史学史的讨论档案选辑》,《历史教学问题》2022年第2期。

㉜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办公室印《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初稿)·附表》(1956年4月),第24页。

㉝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办公室印《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初稿)·附表》(1956年4月),第17、22、32页。

㉞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印《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初稿)》(1956年6月),第22页。

㉟[苏]《历史问题》编辑部:《苏联关于历史科学史的研究》,田舍摘译,《历史研究》1959年第11期。

㊱[苏]《历史问题》编辑部:《论历史科学史的研究》,郝镇华译,《史学译丛》1956年第2期。

㊲[苏]《历史问题》编辑部:《论历史科学史的研究》,郝镇华译,《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12期。

㊳1955年,杨翼骥在南开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自述受到苏联《论历史科学史的研究》的鼓舞,“感觉来自苏联的此篇社论,有可能成为中国史学史复兴的契机,更加积极地投入中国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参见乔治忠《史学史在历史学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乔治忠教授访谈录》,《史学史研究》2019年第3期。

㊴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办公室印《外国古典和近代有参考价值学术著作翻译整理出版计划一览表》,《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初稿)·附表》(1956年4月),第54页。

㊵金毓黻:《中国史学史·重版说明》,商务印书馆,1956,第1页。按,关于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在1957年被商务印书馆再版,姜萌认为是“保持”和延续20世纪30~40年代史学史研究“偏重历史文献学的风格”的具体表现,这一观点实际上脱离了1956年史学界兴起史学史研究热潮的背景,忽视了金氏自述其著作再版仅是“新型的中国史学史”出现之前的短暂替代的现实。参见姜萌《范式转移与继往开来:中国史学史研究一百年》,《清华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㊶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办公室印《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1958年7月),第13~15页。1958年7月,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响应《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号召而制订《跃进计



划》，规划在1961年和1962年开设“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在中国的诞生和发展”。[首都师范大学教务处档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跃进计划》（1958年7月），档案号：1958-1-4]10月，由陈绍畴讲授“中国四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斗争简史”，科目要求：“使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在中国的诞生及其发展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和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历史学的斗争过程。并培养学生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区别，锻炼与提高分析批判能力。”[首都师范大学教务处档案：《历史系教育计划（草案）》（1958年10月9日修订），档案号：1959-4-2]1960年，陈绍畴在授课基础上写作《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四十年斗争简史》，使其在科学研究中“提高很快”。（首都师范大学教务处档案：《中国近现代史教研组总结》，档案号：1960-4-7）1961年，北京师范学院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出版油印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诞生和发展》。讲义回顾“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在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被压迫、被限制到完全占统治地位的发展过程”。参见《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诞生和发展（北京师院稿）》（油印本），第1页。

⑤陈启能：《关于苏联苏维埃时期史学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历史研究》1961年第1期。

⑥张广智：《春意遍于华林——1961年“史学史热”追忆》，《历史评论》2021年第3期。

⑦宫陈：《20世纪60年代初上海史学界关于史学史的讨论档案选辑》，《历史教学问题》2022年第2期。

⑧郭澎整理《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

⑨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关于参加文科教材编选工作的通知》，北京师范大学教务处档案：《一九六一年教育部有关文科教材编选工作的文件及本校文科四系（教、中、历、政）教材选编计划和统计》，档案号：1961-11-1。

⑩《北京师范大学1961-1962学年教学工作纲要（草案修改稿）》，北京师范大学教务处档案：《一九六零年——一九六一学

年教学工作纲要及本科五年制教学计划和执行教学计划的情况》，档案号：1961-2-1。

⑪参见《历史系1960年入学班过渡教学计划表》（1961年7月3日）、《历史系三年级过渡教学计划表》（1961年7月3日）、《历史系1959年级及1960年级过渡教学计划说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系二年级、三年级过渡教学计划（附说明）》，北京师范大学教务处档案：《文科各系1958年入学及其它年级过渡教学计划》，档案号：1961-4-7。

⑫《1960-1961的四年级劳动学习统计》，首都师范大学教务处档案：《1960-1961第一学期教学工作简结及今后工作安排》，档案号：1961-3-24。

⑬王玉婷：《新中国成立初期陈守实的“中国史学史”教研述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3年上卷。

⑭来自2024年5月15日对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桂遵义教授的通话采访。

⑮四川大学教务处档案：《学校1964-1965学年第一学期课程表》，档案号：1964-62-7。

⑯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修订《辞海试行本第8分册历史·分类词目表》，中华书局，1961，第15页。该则材料由刘开军老师提供，谨致谢忱。

⑰金毓黻：《重版说明》，《中国史学史》，第1页。

⑱郭澎整理《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

⑲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办公室印《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初稿）·附表》（1956年4月），第24页。

⑳周文玖：《从梁启超到白寿彝——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的学术系谱》，《回族研究》2005年第2期。

㉑如，刘节曾以金毓黻重视梳理史家、史著为榜样，在20世纪60年代初尝试应用阶级分析探究史学史分期和研究方法。参见刘节《刘节日记》上册，1939年2月24日，大象出版社，2009，第38页；谷风《刘节教授认为：中国史学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可分五个时期》，《学术研究》1962年第6期。